

從轉型政策效應論獨協國家 之顏色革命*

洪美蘭**

- 一、前言
- 二、私有化政策及其效應
- 三、對外開放政策及其效應
- 四、結論

獨協國家政府已透過選舉制度還政於民；經由私有化政策將經濟權回歸人民；並採取對外開放政策融入國際社會。然而，轉型多年後獨協國家卻陸續發生群眾街頭運動式「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顯示政府轉型政策並未達成符合人民對改革預期之成果。因此，本文冀圖以結果論觀點，將「顏色革命」視為轉型政策落實後之反饋效應(repercussion effects)與最終結果，依此結果選擇曾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為研究標的，檢視其國家政府轉型政策落實情況及其轉型政策效應，解析當地轉型發展障礙，探討顏色革命所隱含之轉型實證意義與啟示，並藉此驗證具強制性「暴力比較優勢」的政府政策之重要性與影響力。意期望獲取其轉型經驗，以為借鏡，裨益其他社會轉型發展，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案(NSC96-2414-H-004-040-MY2)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國科會經費補助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鉅細靡遺地批評指教。

**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專任副教授。E-mail: mlhung@nccu.edu.tw
投稿日期：二〇〇八年四月八日；接受刊登日期：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8/第二十六卷第三期/頁 149-196。

發揮本文實務性價值。此外，有鑑於國內對轉型或獨協國家之研究，多偏向於以政治理論、外交或安全戰略為主，故本文將轉向於著重經濟層面的政策效應分析，選擇獨協國家此次改革主體中的私有化政策與對外開放政策兩項變數進行剖析，以期達成深入分析和廣化國內對獨協國家研究議題之目的，為轉型發展研究提供經濟分析面向的觀察視野，增加本文學術價值。

關鍵詞：獨立國家國協、政策效應、顏色革命、私有化政策、政府失靈

一、前言

「轉型」(transition) 意指社會體既定的行為互動模式或發展型態處於轉變中，人們在此過程中修訂、創造或歸納出眾所接受的活動規範與遊戲規則，演發為常規型態 (regular form)、制度 (institution)。¹ 在此複雜的重建過程中，轉型國家政府決定採行之轉型政策，因國家具「暴力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iolence) 之強制性，² 使其可能促進轉型發展，亦可能對轉型經濟體所處的部分均衡 (partial equilibrium) 帶來衝擊，³ 引發經濟社會失衡狀態出現。2003~2006 年間部分「獨立國家國協」(以下簡稱「獨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之成員國接連發生群眾以街頭運動方式要求執政黨下臺之「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⁴ 即是後共產主義轉型經濟體由一種部分均衡邁向另

-
1. 轉型定義為作者參閱 North (1991: 83-91) 和姜新立 (2004: 278) 等學者的闡述來理解歸納之。
 2. North (1981: 21) 指出：國家在其地理領域內對界定和執行產權地位或對國民徵稅等方面皆有一定的強制力，故稱之為「暴力比較優勢」。
 3. 此乃從經濟學觀點出發，指出轉型是經濟體從一種形成經濟社會遊戲規則的部分均衡狀態，邁向另一個新均衡的過程，強調經濟學上動態均衡發展的概念。詳參：North (1991: 83-91)。
 4. 格魯吉亞 (或稱喬治亞) 反對黨不滿國會選舉結果於 2003 年 11 月 2 日率眾要求總統下台，引發玫瑰革命；2004 年 11 月烏克蘭民眾抗議總統選舉舞弊爆發橘色革命；2005 年 3 月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或稱黃色革命) 迫使阿卡耶夫 (Askar Akayev) 總統出走俄羅斯；2005 年 5 月烏茲別克人民不滿就業機會少和政府壓抑私人交易爆發號稱棉花革命或白色革命之安集延與科拉蘇夫動亂；2005 年 11 月阿塞拜疆 (或稱亞塞拜然) 反對黨 — 「自由聯盟」對議會選舉不滿引發紫羅蘭革命；2006 年 3 月白俄羅斯亦發生抗議總統大選結果之示威遊行。這些獨協國家都發生群眾以街頭運動方式訴求執政者 (黨) 下臺。本文將此類具共通性質之群眾運動皆視為「顏色革命」，故以此六國為研究標的。然而，

一個新均衡過程中之失衡現象。這類具衝突性、社會分裂對立狀態的出現可視為是轉型成本，此種轉型成本的付出並非完全對經濟轉型無益，⁵ 但儘量在轉型過程中降低轉型成本，卻是任何轉型經濟體之最高原則。因此，本文冀圖以結果論的觀點，將群眾街頭運動式「顏色革命」視為轉型政策落實後之反饋效應(*repercussion effects*) 與最終結果，依循此結果選擇曾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為研究標的，檢視這些國家政府轉型政策落實情況及其轉型政策效應，剖析當地轉型發展障礙，探討「顏色革命」所隱含之轉型實證意義與啟示，並藉此驗證政府政策之重要性與影響力。換言之，本文意圖以結果論的研究途徑回溯分析顏色革命發生之遠因 - 轉型政策的經濟社會效應，獲取獨協國家轉型經驗，作為借鏡，裨益其他社會轉型發展，發揮本文實務性價值。

不過，轉型體處於經濟社會規範重建的過渡時期，政府因應各種內、外部因素與針對經濟轉型目標所規劃或進行之政策將相當繁雜。對後共產主義國家而言，在經濟轉型方面，政府首要任務乃是建構以私有為主體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故私有化政策成為此次改革的主體內容，且是其經濟轉型發展的內部關鍵元素。而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原則不只是在內部市場，在全球化趨勢下，這些國家亦多以開放市場，即從過去封閉經濟體轉為開放經濟體為目標，因此，來自國際間各種政、經要求就成為影響其轉型發展的重要外部因

「顏色革命」是否為真正的革命仍有爭議，如吳玉山在「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一文中就認為喬治亞、烏克蘭與吉爾吉斯相繼發生的「顏色革命」並非為真正的革命，但亦有說法將2000年在塞爾維亞出現推翻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民主運動也視為顏色革命之一，且是第一件事例。關鍵在於「革命」的意義與認知有所差異。詳參：吳玉山(2007: 67-112)及McFaul(2005: 5-19)。

5. 如若從社會衝突論之功能意義而言，「衝突」事實上可作為解釋社會秩序的一個變項，亦可作為整合社會的一個機制而存在。詳參：李英明(2002: 175-176)。

素。尤其是獨協國家位居歐美和俄羅斯兩大強權間，在國際政經架構體系中具有特殊的地緣戰略意義，故政府的對外開放政策顯得格外重要。所以，本文將以後共國家中最重要的轉型政策 - 私有化政策與對外開放政策兩項變數對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進行剖析，以達深入分析轉型政策效應之目的。此外，有鑑於國內對轉型或獨協研究，多偏向於以政治理論、外交或安全戰略為主，⁶故本文將著重於經濟層面之政策效應分析，以廣化國內對獨協國家研究議題，深化國人對獨協地區經濟轉型之認知，同時為轉型發展研究提供經濟分析面向與新觀察視野，提高本文學術價值。

二、私有化政策及其效應

(一) 政策目標與現實落差

依據經濟轉型理論，計畫經濟制度的共產國家朝向「市場化」策略中，實施私有化政策的基本目的乃在於藉由產權私有化與經營權民營化之同時進行，⁷達成建立以私有為主體之自由競爭市場機制，以提高生產效能與經濟成長。換言之，私有化政策不僅是在法律上賦予私人所有權，或經濟上財產權的轉為民有，其背後更重要的是國有企業私有化後市場競爭機制之形成，以使企業在競爭環境中自我成長和現代化，不再依賴國家保護與補貼 (Frydman and Rapaczynski, 1991: 253-255)，達成企業自負盈虧、經營自我負責之

6. 譬如：龍舒甲 (2003: 95-113) 和蘇武 (2000: 94-98)。

7. 產權為資產使用權 (the usus)、收益權或稱孳息權 (the fructus)、處分權 (the abusus) 等權利之統稱，這些權利可分屬不同人，因此，在法律上須將個人究竟擁有何種產權定義清楚。詳參：吳玉山 (1996: 29-31)。

「自主性」。故私有化政策實施方案中，政府首要任務乃是根據切斷法則（truncation theorem）斷絕國家與企業之關聯性，讓企業自我承擔盈虧之責。其次，私有化政策涉及生產要素與工具的取得、佔有和支配權利的重新定位、利益分配機制選擇等相當龐雜之社會資產重分配問題，故公開地將原屬於全民所有，即公共所有權下的社會資產公平地重分配移轉給個體是政策落實之基本要求。因此，「公平公開」及「企業自主」是私有化過程中建立所有權的重要原則。

白俄羅斯政府定義，該國私有化目標在於藉由將國有企業轉為股份公司型態，達到逐漸實現增加生產效能之目的（駐英國台北代表處，1998）。而烏克蘭政府於1994年11月頒布有關私有化的總統令，也宣示要發行記名不可轉讓之股權憑證（voucher）讓所有公民皆可參與購買私有化企業（洪美蘭，2000：509）。吉爾吉斯1991年12月通過的「非國有化、私有化和企業經營活動總則法」（General Foundations of Denationalization, Privat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⁸開宗明義指出：非國有化的目的在於取消國家對財產管理的直接作用（趙乃斌、姜士林，1995：231、240）。烏茲別克獨立後所頒布的相關私有化法亦規定，各種所有形式一律平等，也就是如其他中亞國家一樣，透過法律保障私有財產（趙常慶，2004：154、173）。因此，簡言之，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其所頒布之私有化政策目標無非在於建立私有財產制、公司制，以經濟產值增長為目的，目標皆是一致性地希望透過社會資產移轉給個人或法人之私有式重

8. 私有化是將公營企業或財產的產權由國家所有移轉為民營企業或私人所擁有；而非國有化則強調國家取消對企業財產的直接管理經營，將企業經營權移轉為民營，但仍可能保有對企業某比例財產的所有權、收益權等產權。詳參：（洪美蘭，2002：27-29；The Government of the Kyrgyz Republic, 1992）。

新配置，達成企業自主經營，建立市場競爭機制。

然而，由於體制內存在著巨大的特權階級(*nomenklatura*)，⁹ 特別是在中亞和白俄羅斯，其菁英份子多屬於保守勢力，對激進轉型策略抱持著質疑態度。譬如：白俄羅斯，由於轉型初期該國軍事與退休人員比其他獨協國家集中，而大多數這些人都反對變革，故當盧卡申科(*Alyaksandr Lukashenka*) 崛起獲得政權後，他們便大力抨擊市場經濟、民主、法律制度以及憲法保證的非核武中立政策，某些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甚至開始鼓吹建立「社會集體性市場(*social-collective market*)」(*Shushkevich, 2003: 55-57*)。因此，白俄羅斯的市場化經濟轉型障礙比他國更加嚴重，私有化進展也相對較為緩慢，如截至 1998 年為止，私有企業總數占全國企業總數的比率為 43.3%，也就是說仍有 56.7% 的企業為國營企業(駐英國台北代表處，1998)。

為了與保守勢力協商，各國變相的轉型政策執行方式紛紛出現，如與私有化政策「切斷法則」相左的準財政活動(*quasi-fiscal activities, QFAs*) 成為這些國家最典型的問題之一。準財政活動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為外在的，即政府發行合約，如擔保品或保險契約來協助既定的經濟活動；另一為內在的，即經濟個體基於口頭承諾或過去經驗而希望政府透過非強制性的契約補償其損失、容忍其逾期欠款、直接信用借款、匯率保證、提供低於市場合理成本的原料、獨占地位的保護等等。此種形式在經由公用事業流入企業及家計部

9. 「*nomenklatura*」原指在共產國家中，一個職位的任命必須得到黨的許可。黨的中央委員會以開會來審查或干涉這些職位的任命，久而久之，這些需要被審查的職位形成一種表列，在這個表內的職位就稱“*nomenklatura*”職位。因此，*nomenklatura* 被引申為不同意義，基本上用以形容官僚、特權之現象。詳參：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2000: 200-203)。

門時占了較大部分。有三個部門是這些活動的焦點：能源是最大部分；其次是水和住房。在能源出口大國，如阿塞拜疆和烏茲別克，能源部門最常被拿來當作支持虧損企業的管道。地方政府在此非支付（non-payment）鏈結中是個重要環節，尤其是在摩爾多瓦（Moldova）與烏茲別克，在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及吉爾吉斯也是如此（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2002: 13）。故採取漸進轉型的烏茲別克，¹⁰ 事實上是保持著國有而少有改革（Åslund, 2003: 77）。即使以激進經改為主的吉爾吉斯，也仍保有政府補貼慣例，但相對於阿塞拜疆而言，後者政府以高預算準財政政策方式來補貼相關企業和人民生活的情况更是普遍。儘管準財政活動規模很難確定，但據估計它們在摩爾多瓦、塔吉克與吉爾吉斯大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 5%至 10%，在阿塞拜疆則超過了 20%（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2002: 13）。

除了準財政活動外，私有化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亦逐漸遠離全民公平參與的原則，如白俄羅斯盧卡申科總統於 1995 年終止 1993 年通過的「股權憑證私有化計畫」。甚至部分國家之特權階級直接透過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壟斷具「錢」景的經濟資產，違反私有化政策公平、公開之基本政策方針，致使私有化未能達成建立自由競爭市場機制之根本目的。官員利用政治權力之利基轉換為經濟權中之所有權或控制經營權，形成私有化貪腐問題，例如：格魯吉亞雖曾以股權憑證之無償自由分配模式進行私有化，但由於國家動盪與私有化進行緩慢，為了加速私有化過程，1997 年 5 月先提出允許無底價的

10. 在 1991~1992 年間，部分中亞國家接受俄羅斯概念下的震撼療法，實施經濟激進轉型，但很快地烏茲別克和土庫曼選擇了自己的發展途徑，採取類似中國的漸進改革為主。詳參 Abazov（1998）。

拍賣私有化，然後同年 8 月謝瓦爾德納茲 (Eduard Shevardnadze) 總統又廢除「延緩策略性企業民營化」法令，致使格魯吉亞重要的重工業大廠紛紛落入財團與外資手中 (駐英台北代表處，1998)，謝氏家族當然也趁機壟斷許多大型企業。而烏克蘭的私有化，¹¹ 自從 1999 年 12 月 29 日庫其瑪 (Leonid D. Kuchma) 簽署「加快烏克蘭資產私有化緊急措施」總統令後，權貴和利益團體即利用加速私有化政策，以特權方式大肆佔有經濟社會資產。最引人詬議的就是 2003 年庫其瑪女婿以低於來自英美合資鋼鐵公司之標價，購得烏克蘭最大煤鋼企業克里沃羅格鋼鐵公司 (Kryvorizhstal) (Fawkes, 2004)，故要求重新審理私有化成為橘色革命的一項因素。¹²

從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私有化實證中發現，私有化政策實施過程弊端叢生，其雖然主要歸咎於政府官員與利益團體之勾結，及相關法規的不完善，但另一方面亦可歸因於私有化政策落實的現實性問題。因為從其私有化政策實施經驗中觀察到：國家政府亦曾企圖採行讓人民皆可公平參與的無償股權憑證方式進行私有化，卻發現由於國有企業存在著很大比例的工業部門資本存量過時，多數企業呈現虧損，有市場投資概念的人民擔心資本有限，無法有效地使資產現代化，終致投資血本無歸，故私有化無法獲得人民青睞與興趣，進展緩慢。經此階段的挫敗，政府轉而採行有償私有化，一方面可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可為虧損嚴重的國有企業找尋有興趣又有財力之核心投資者 (the core investor)。原本期望透過公開透明

11. 在 1992~1994 年間，主要以職工團體租賃或購買方式進行。1995~1998 年間改以股權憑證自由分配模式私有化。但從 1999 年起轉為有償之招標拍賣方式進行私有化，大部分以優惠的競爭價格出售，但投資者必須承擔投資義務。

12. 然而，橘色陣營的提摩申科 (Yulia Tymoshenko) 之女婿趁蘇聯解體取得國家能源成為億萬富豪，以及她本人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未公開交易等行為，亦令人詬議。

的二次交易 (secondary trading) 形成外部所有者，或者在國家保有所有權下將經營權民營化，提振生產效率，但此二者皆未如願，卻在訴諸於其他附加條件方式來加速私有化過程中，促成官商勾結的好時機，使企業淪為「有心人」手中，而未能真正找到「有能力」的核心投資經營者或外部所有者，企業損失加速現代化、效率化營運之重生機會，私有化對經濟成長之貢獻因而有限。不過，在加速私有化過程中，除了發生賤賣國產、官商勾結等負面現象外，也不能抹殺其正面的貢獻，如格魯吉亞經過 1997 年第二階段經改的加速私有化過程，雖導致重要工業大廠落入財團與外資手中，但在歷經 1998 年俄羅斯盧布崩盤的金融風暴後，該國經濟成長情況卻是有目共睹，其中因加速企業私有化而來之貢獻仍無可否認。

換言之，這些國家經濟轉型之私有化政策捨棄了原先規劃「國家資產全民分享」之公平分配原則，不但使私有化變成各方利益團體角逐之新競技場，容易引起爭議與社會不安，更重要的是違反私有化資源再分配政策之公平正義原則與建立市場競爭機制之最重要政策目標。雖然無論採行何種私有化模式，經濟轉型的私有化勢必在資源再分配過程中使社會財富產生重分配效果。然而，若是採行股權憑證模式私有化，隨後因憑證正式轉化為股權，由於各個企業經營情況不同而產生財富差異時，基本上仍是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因為這表示人民仍皆有過公平參與分享國有資產之機會，即經濟機會是平等的，只是因市場競爭終至個人投資報酬差異而促使財富趨於差異化。¹³ 然而，若如上述，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新興資產階級的

13. 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個人報酬取決於「各取所值」(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merit) 或「各取所獻」(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contribution) 致使最終報酬有所區別是合理的自然現象，若要求所有社會成員之最終報酬一致化，反而會淪入非真正公平之「平均主義」(equalitarianism) 陷阱。

產生卻是透過官商勾結占取資源致富者，此種資產被壟斷之財富不均將使擁有資產者恆富，而無資產者將因立足點的不平等而難於改變貧苦狀態，顯然違背轉型社會資源分配之公平原則，將對轉型社會帶來貧富不均的失衡發展效應。而格魯吉亞與烏克蘭在進行私有化時發生的貪腐，以及中亞國家在出售公有財與為特權服務時的貪瀆，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 (Åslund, 2003: 80)。

(二) 貪腐文化與貧富不均反饋效應

私有化政策執行上的缺陷與現實落差經過多年的轉型發展，逐漸對轉型經濟體產生影響並引發相關反饋效應。首先，準財政活動式補貼造成現代化與節省誘因之缺乏，使得經濟資源大量浪費而壓抑經濟發展，如吉爾吉斯能源消耗量是美國每單位國內生產毛額消耗量的三到五倍，且產出是收入的 1/200 (Slaughter, 2002: 62)。因此，若以轉型經濟體之經濟成長率來相互比較將發現，獨協國家經濟轉型普遍落後於中東歐波蘭、捷克等轉型國家，譬如：當中東歐主要國家 - 波蘭、捷克皆於 1993 年即恢復為正成長，其成長率分別為 3.8%與 0.6%，並進一步於 1995 年分別達到 7.0%與 5.9%之高成長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1: 213; 205)。然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 (參閱下表一)，一方面因轉型起步較晚，如烏茲別克私有化於 1994-95 年間才開始；另一方面因違反激進轉型緊縮財政政策理論之軟預算式準財政活動使經濟缺乏效率情況依舊殘存，¹⁴除格魯吉亞外，截至 1995 年時，其他國家皆處於經濟負成長，其中

14. 軟預算式準財政活動意指政府並未嚴格執行私有化政策的「切斷法則」，仍透過準財政活動對企業進行直接或間接性的補貼，使其預算淪為軟預算 (soft budget)。

烏克蘭甚至持續衰退至 1999 年。

表一 部分獨協國家經濟成長率

單位：% (實質年變動率)

年\國家	阿塞拜疆	吉爾吉斯	烏克蘭	烏茲別克	白俄羅斯	格魯吉亞
1990	-11.7	5.7	-4.0	1.6	-3.0	-7.4
1991	-0.7	-7.9	-10.6	-0.5	-1.2	-11.7
1992	-22.6	-13.9	-9.7	-11.1	-9.6	-41.8
1993	-23.1	-15.5	-14.2	-2.3	-7.6	-8.8
1994	-19.7	-20.1	-22.9	-4.2	-11.7	5.4
1995	-11.8	-5.4	-12.2	-0.9	-10.4	6.9
1996	0.8	7.1	-10.0	1.6	2.8	5.9
1997	6.0	9.9	-3.0	2.5	11.4	3.3
1998	10.0	2.1	-1.9	4.3	8.4	7.3
1999	11.0	3.7	-0.2	4.3	3.3	3.3
2000	11.1	5.4	5.9	3.8	5.8	5.9
2001	9.9	5.3	9.2	4.1	4.7	9.6
2002	10.6	0.0	5.2	4.0	5.0	13.2
2003	11.2	7.0	9.6	4.2	7.0	13.9
2004	10.2	7.0	12.1	7.7	11.4	10.1
2005	26.4	-0.2	2.6	7.0	9.4	14.0
2006	34.5	2.7	7.1	7.3	9.9	13.4
2007	30.0	7.5	6.8	9.3	8.5	8.5

說明：2006 年數據為估計值；2007 年數據為預計值。

資料來源：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08。

長期經濟衰退致使國民所得一年比一年惡化，當多數人民深受經濟轉型衰退衝擊而生活水準下降之際，卻見部分官員因貪瀆而生活未受影響，甚至隨著轉型而改善、致富，促使貧富差距擴大。如以最常見的社會不均指標 - 基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為例，自 1990 年起至 90 年代末，獨協國家收益不均程度大幅上升，以所得

計算之吉尼係數從 0.2-0.3 增加一倍至 0.4-0.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2002: 9)。經濟社會朝向兩極化不均發展，陷入不公平矛盾，埋下顏色革命因子。故貪腐被視為是此波顏色革命最重要社會因素之一。而事實上官員貪瀆可歸咎於違反私有化政策「切斷法則」的準財政補貼活動，主要在於該活動使官員有利用政治職務主動索賄或被動接受廠商行賄之機會，與企業分享軟預算經濟利得，利益分贓使經濟轉型運作陷入官商勾結之貪腐文化。故在獨協經濟社會中，對大企業而言，主要問題在於缺乏官員庇護就無法營運，以及大型投資多需要與源自商業的執政掌權集團有良好個人關係 (Åslund, 2003: 81)。

觀察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私有化政策落實過程亦發現，部分官員甚至利用經濟轉型期間法規與制度未健全的機遇與利益團體結合，大肆占取高獲利或高成長性經濟資產，成為新階級。私有化淪為官員和利益團體致富的重要途徑之一，不但與原規劃政策目標完全相左，違背私有化政策初衷，甚至變成貪腐的根源與工具。也就是說，部分政府官員為了使自己生活不受到經濟衰退影響，常利用職務之便以不正當手段獲取財物，形成功能性貪腐 (functional corruption)，而貪腐實質上也是其他經濟機會缺乏的合理反映 (Slaughter, 2002: 63)。

簡言之，官員透過非法與合法途徑成功地將其「政治權力」轉換為「經濟權利」。前者使得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和刑事犯罪叢生，引起社會強烈不滿；後者則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形成利益團體與不同的政府管轄部門形成各自的網絡關係，競租 (rent-seeking) 行為充斥 (Havrylyshyn and Odling-Smee, 2000: 7-8)，影響經濟發展，特權間彼此爭奪，形成經濟社會不安因素之一。如眾所周知，吉爾吉斯

前總統阿卡耶夫 (Askar Akayev) 的政權乃是建立在宗族和地方派系基礎關係上，與前副總統庫洛夫 (Felix Kulov) 皆代表著北方利益團體，而「鬱金香革命」 (Tulip Revolution) 的領導者巴基耶夫 (Kurmanbek Bakiyev) 卻是出身於南方派系菁英，地方派系因利益分配爭權奪利，時分時合，形成「國家罪犯化」 (State Criminalization)。¹⁵ 又如：烏克蘭頓巴斯 (Donbass) 煤礦、重工業財閥和亞努克維奇 (Viktor Yanukovych) 總理形成利益群體 (Osipian and L. Osipian, 2006: 496-517)，而德聶伯彼得洛夫斯基克區 (Dnipropetrovsk) 天然氣富商提摩申科 (Yulia Tymoshenko) 和曾任國家銀行主席及現任總統尤申科 (Viktor Yushenko) 亦組成改革派利益集團，兩大陣營彼此相互抗爭，互批對方貪瀆違法。¹⁶ 根據「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的年度報告 (參閱下表二) 發現，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其清廉指數與排名普遍皆相當落後，證明這些國家貪腐文化情況的確嚴重。

15. 擔任巴基耶夫總統內閣總理的庫洛夫與國會議長批評鬱金香革命後政府官員心態未改，總統與總理不合檯面化，導致 2007 年 1 月辭職倒戈至反對陣營，要求提前舉行總統大選。巴基耶夫則以議員和憲法法院產生無法調和為由，於 10 月解散議會，宣佈 12 月 16 日舉行議會選舉，並由其政黨獲勝，成為議會第一大黨。

16. 橘色革命因兩大陣營的政爭，餘波盪漾至 2007 年 9 月完成提前舉行之國會大選後，才暫時歇止。雖然現由提摩申科擔任總理，但從國會大選中兩大陣營得票率相當接近來看，政爭恐將仍是烏克蘭政局穩定的隱憂。

表二 部分獨立國協國家之清廉指數與排名

年\國名	白俄羅斯	烏克蘭	格魯吉亞	阿塞拜疆	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
1998	3.9 (47)	2.8 (69)	-	-	-	-
2000	4.1 (43)	1.5 (87)	-	1.5 (87)	-	2.4 (79)
2001	-	2.1 (83)	-	2.0 (84)	-	2.7 (71)
2002	4.8 (36)	2.4 (85)	2.4 (85)	2.0 (95)	-	2.9 (68)
2003	4.2 (53)	2.3 (106)	1.8 (124)	1.8 (124)	2.1 (118)	2.4 (100)
2004	3.3 (74)	2.2 (122)	2.0 (133)	1.9 (140)	2.2 (122)	2.3 (114)
2005	2.6 (107)	2.6 (107)	2.3 (130)	2.2 (137)	2.3 (130)	2.2 (137)
2006	2.1 (151)	2.8 (99)	2.8 (99)	2.4 (130)	2.2 (142)	2.1 (151)
2007	2.1 (150)	2.7 (118)	3.4 (79)	2.1 (150)	2.1 (150)	1.7 (175)

說明：未括弧者為清廉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括弧內為當年度在羅列評比國家總數中之排名，每年參與評比之國家數目並不相同。

資料來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7。

轉型期間形成的階級化經濟社會和資源分配不公問題在經濟邁入成長期後，因為新興資產階級與利益團體壟斷了資產而獲取經濟轉型與經濟成長的大部分利得，更加凸顯出其不公平，大部分人民無法享受到經濟成長利益，從經濟已恢復成長近十年，但人民年均所得仍普遍低落便可證明（見表三），經濟增長並沒有促進普遍性的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無法隨著經濟成長而獲得大幅改善或提升。政府長久以來承諾的經濟改革並未收到實效，在經濟衰退期間人民可將其視為經濟轉型的陣痛期而包容政府的無政績。然而，在經濟成長期間，經濟成長果實未能普及化，經濟成長反而凸顯出政、經社會的不合理現象，促使人民認清政策的不公平性，終致對政府失望而訴諸顏色革命，故顏色革命發生於經濟成長期間。

表三 部分獨協國家人民平均所得

單位：美元/年

年／國名	白俄羅斯	烏克蘭	格魯吉亞	阿塞拜疆	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
1993	357.624	567.617	-	179.092	148.472	255.494
1994	474.579	702.849	166.843	297.162	244.398	296.147
1995	1032.980	718.894	395.595	314.519	325.406	454.166
1996	1425.365	872.738	651.620	409.191	389.204	609.713
1997	1384.399	991.088	784.259	505.567	373.087	628.937
1998	1503.362	834.498	803.560	540.852	348.962	624.035
1999	1208.070	632.640	627.159	571.507	260.378	700.140
2000	1276.999	638.996	685.891	652.471	278.300	557.615
2001	1248.237	784.377	728.265	701.095	307.832	466.765
2002	1480.365	883.121	776.665	760.215	321.724	382.553
2003	1809.588	1052.716	919.236	880.202	380.895	396.086
2004	2361.337	1372.292	1184.481	1040.080	435.173	463.299
2005	3088.822	1765.974	1479.349*	1492.911	477.391	520.922
2006	3808.313*	2273.979	1778.941*	2336.029*	541.993*	605.225*
2007*	3958.339	2648.630	2123.101	3356.239	624.817	699.632

說明：「-」表資料缺乏；「*」表估計值。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

若進一步比較分析「顏色革命」國家在發生革命前之相關經濟社會數據。首先，從國民所得來看。基本上顏色革命發生於2003年11月至2006年3月間，故以2003年人均所得為例，中亞的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人民年均所得低於500美元（參閱表三），¹⁷原蘇聯大國之一的烏克蘭亦僅有1000餘美元，而白俄羅斯最高，有1800餘美元。截至2005年為止，除了白俄羅斯國民所得突破3000美元外，其他「顏色革命」國家皆尚未達到2000美元，顯示這些國家市場化經濟轉型後，雖然人民重拾經濟權，如私有財產權，可在市場

17. 但由於吉爾吉斯不合理的稅務結構、功能性貪腐、競租現象等總合效果使得該國經濟有高達80%或更多比例之地下經濟活動，由於這些經濟活動難於掌握和呈現在國內生產毛額上，故事實上人均所得應當更高些。詳參 Slaughter (2002: 63)。

中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但普遍上人民所得並未獲得顯著成長。

其次，以衡量社會所得均度之吉尼係數（見表四）來分析將發現，採取漸進改革的白俄羅斯和烏茲別克，在總統集權嚴格控制與不事先進行大規模私有化資源再分配的情況下，逐步調整產業結構，不但避免轉型期間不完善的現存市場對資源配置所造成的不合理性，亦使社會資產未被壟斷，故白俄羅斯在經濟轉型期間吉尼係數變動不大，1992至2002年間其吉尼係數維持在33.7%至37.3%間（參閱下表四）缺乏完整數據的烏茲別克，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近年來的調查中亦顯示，其吉尼係數從2001~2003年間分別為35.49%、32.60%、35.45%（Åslund, 2003: 88），顯然變動亦不多。但1992~2002年經濟轉型期間，烏克蘭、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吉爾吉斯之吉尼係數則相對地顯著增長，例如：烏克蘭從25.1%成長至41.8%；格魯吉亞亦從36.9%成長至45.4%；阿塞拜疆由36.1%成長至50.8%；吉爾吉斯則從30%成長至49%（見表四），社會不均相形下呈現嚴重惡化現象。

表四 部分獨協國家之吉尼係數

單位：%

年\國名	白俄羅斯	烏克蘭	格魯吉亞	阿塞拜疆	吉爾吉斯
1992	34.10	25.10	36.90	36.1	30.00
1995	37.30	38.46 ^a	-	45.9	39.50
1998	35.10	39.10	50.30 ^b	46.2	42.90
2000	33.70	46.20	-	50.6	47.00
2001	34.30	45.20	45.80 ^b	50.1	51.20
2002	34.20	41.80	45.40 ^b	50.8	49.00

說明：

1. 本表吉尼係數是以毛收益（Gross Earnings）計算而來，但a是以家計預算之消費所得衡量的吉尼係數；b是以家計預算之可支配所得衡量的吉尼係數。

2. “-”表資料缺乏。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6。

最後，觀察經濟社會之貧窮狀態。以個人所得低於該國最低消費籃(the minimum consumption basket)定義之國家貧窮線(national poverty lines)來分析發現，1999年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吉爾吉斯都有超過半數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窮線下(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2002: 9)。依吉爾吉斯官方統計，2003年該國有45%的貧窮人口，有13.4%的人民處於極度貧窮狀態(Трубицин, 2006: 218)。2003年格魯吉亞人民每月平均所得低於65美元的貧窮者也高達四百五十萬餘人(Wright, 2004: 1)。進一步與聯合國「2006年人力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統計數字比較發現，格魯吉亞人民生活在國家貧窮線下的人口比率仍持續維持在相當高的比率為54.5%，其次為阿塞拜疆49%和吉爾吉斯的47.6%。相對而言，烏茲別克的貧窮人口有所改善，其數據為27.5%(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7)。

換言之，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吉爾吉斯等國之貧窮人口在近年來並未明顯減少；人均所得亦未顯著增長，仍普遍低落(參閱表三)。然對照其經濟成長數據(參閱上表一)，格魯吉亞、阿塞拜疆經濟呈現持續成長已歷經多年，2006年阿塞拜疆甚至有高達34.5%之經濟成長率。證明經濟統計數字與現實生活出現落差。此不但是這些經濟轉型國家的特殊現象，更耐人尋味地凸顯出和印證了經濟成長的利益和經濟福利未能普及化之實際經濟社會狀況。理論上市場化與民主化轉型後，人民生活會獲得改善，¹⁸但在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其實際情況卻與理論不符。這些國家之人民對政府轉型政策的期待與希望落空，故「窮則思變」是導致人民對

18. 例如：研究發現，民主化將使所得分配的底層階級受惠。詳參 Gerry and Mickiewicz (2006)。

政府完全失去信賴，進而以顏色革命來表達其對「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之不滿。

因此，人均所得低且吉尼係數相對較高的烏克蘭、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吉爾吉斯，即社會不均情況較顯著的國家，或貧窮人口始終未改善減少的格魯吉亞、¹⁹阿塞拜疆和吉爾吉斯，這些國家反政府之顏色革命相對應也獲得較多人民的響應，革命情況較為激烈。反觀烏茲別克顏色革命之示威運動很快地被壓抑下來，²⁰而白俄羅斯顏色革命更尚未成型。其中，分析白俄羅斯之經濟社會狀況和顏色革命情況亦發現，雖然轉型初期白俄亦歷經嚴重經濟衰退期，但從1996年起總體經濟恢復復甦且表現出穩定的成長(參閱表一)，其社會財富分配亦較其他取樣國家均等(參閱表四)。白俄羅斯政府在教育、醫療衛生等民生方面也相當關注並確實取得進步。白俄羅斯可說是目前獨協國家中社會福利較好的國家之一。難怪選舉後雖然有一些抗爭活動，但要發酵為像鄰國烏克蘭或其他獨協國家那樣的顏色革命是不太可能，因為畢竟盧卡申科總統在經濟上有其政績，故白俄羅斯反對派行動並沒有「市場」，顏色革命未能成氣候。不過，反對派之群眾運動雖未發酵，但畢竟還是發生了，此亦顯示白俄羅斯的經濟情勢並非完美無瑕。根據「獨協統計委員會」(CIS Statistical Committee)資料顯示，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之通貨膨脹年成長率，白俄羅斯通常是獨協國家中的第一名。白俄羅斯盧布不穩定易貶值乃肇因於該國之交易單位過於多樣化

19. 玫瑰革命後勝選取得政權的薩卡什維利(Mikhail Saakashvili)總統，執政四年後，格國貧窮與失業現象仍相當嚴重，政府再次遭反對派指責貪污，並率眾示威，提前於2007年11月25日下台，雖然在提前舉行之總統大選中再次執政，但支持率已經比上次減少大約一半。

20. 雖然西方國家認為這是政府武力鎮壓的結果。

(Shushkevich, 2003: 57-58)。通膨問題對盧卡申科總統及其政府而言，仍是其未來政經社會能否穩定發展的隱憂。

由上述分析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其最關鍵之經濟轉型政策 - 私有化政策後發現，政策目標與現實落實情況確實出現明顯落差，且從「顏色革命」國家實施私有化中觀察到，之所以出現與政策目標相左的經濟轉型落後、經濟衰退期相對較長、貪腐文化、社會貧富不均等負面後果，進而引發顏色革命效應，除了原本國有企業就呈現虧損嚴重狀態，使人民參與私有化意願低落之特殊因素外，最主要仍須根結於政府執行方面的缺陷與缺乏行動力。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官僚體系造成施政效能低落與國家索賄情況日益嚴重。依據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研究顯示，市場自由競爭未完善之經濟轉型落後國家其國家索賄指數通常較高，而「顏色革命」國家亦確實出現「經濟轉型落後且其國家清廉指數皆相對低落」之現象。換言之，轉型政策失靈又將提高國家索賄的機會，兩者將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當經濟政策執行不當或不完善，發生政府失靈現象時，將致使政治市場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 反應在經濟市場之交易成本上，徒增經濟轉型成本或使轉型困難度提高，²¹ 特別是當政策執行不當引發經濟不均之質量失衡發展時，人們對制度不均衡的敏感程度開始發酵，因而引發革命性的政策反彈效應。「顏色革命」國家之例證即是：因私有化政策及其執行問題，使官商勾結有機可乘，促成貪腐文化和轉型不公之社會貧富差距現象，這些經濟社會現象在經濟成長下趨於普遍化與顯著化，也就是經濟成長促使

21. 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之情況再次印證了 North 「政治規則和經濟規則相互影響」之理論觀點。詳參 North (1991: 48-53)。

社會富有階層財富累積加速，未能分享經濟成長利益的貧民，其經濟窘境相形惡化，終至人民在經濟轉型多年且經濟成長之際訴諸於街頭運動，要求改革，謀取公平的經濟機會。故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等此類轉型政策負面效應程度較高的國家（如社會不均情況顯著惡化），其顏色革命因易獲民眾響應而成功；相對而言，烏茲別克、白俄羅斯和阿塞拜疆等國的顏色革命卻未能順利成功，足證轉型政策效應確實是決定獨協國家顏色革命的關鍵因素。

儘管研究指出，不均提高之負面影響乃是自由化與市場化轉型的短期效果，長期而言，若是經濟體在轉型過程能儘早完成自由化、穩定化，達到完全民主國家，所得不均將維持在較低的水準（Gerry and Mickiewicz, 2006: 27-28）。但若社會不均貽害這類短期效果讓人民深感經濟機會權益被剝奪，社會資產分配不公，經濟資源為少數人壟斷時，革命當然隨之而至，對轉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帶來衝擊。故獨協國家的「顏色革命」再次驗證，在市場機制尚未成熟，真正發揮主導經濟發展力量的情況下，政府轉型政策作為將成為決定經濟發展成敗的重要關鍵之一。這些國家的經驗凸顯出政策及政府施政效能對轉型經濟體之重要性與影響力。但不幸的是，發生「顏色革命」的獨協國家雖然透過私有化政策將經濟權回歸人民，然私有化政策挫敗引發社會不均與利益團體鬥爭等政、經社會對立與不穩定狀態，卻反而成為這些國家未來政、經社會發展之新障礙，為其國家發展增添變數。

三、對外開放政策及其效應

(一) 新地緣政經關係

獨協國家是蘇聯瓦解後之新興主權國家，其特殊地理位置 - 夾處於以歐盟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兩大勢力間，使此地區成為兩大陣營的新緩衝帶，並擁有聯繫歐亞經濟走廊之稱，新地緣政、經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與歐美和俄國兩大強權間之政、經互動關係將深切地影響著這些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外部新地緣政、經關係之抉擇與運作也成為這些轉型經濟體最重要的對外政策。也就是說，對這些新加入國際社會的獨協國家而言，對外政策面臨兩項首要任務：一是建立國家在國際上之良好形象；其次是自我定位 (self-identity) 的抉擇，即其歸屬於亞洲國家或歐洲國家或是第三世界成員，但基本上他們皆相信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層面而言，皆是東歐的一部分，或至少是歐亞國家(Abazov, 1998)。故在分析對外政策效應方面，將簡化其外交互動對象，僅以顏色革命國家與歐美和俄羅斯之情況為觀察變數，以利深入剖析政府對外政策對轉型經濟社會的相關效應與影響，及其與顏色革命發生之關係。

當獨協這些新興主權國家面對經濟轉型困境時，其過去傳統盟邦 - 俄羅斯亦因自身轉型衰退而經濟實力下滑，在自顧不暇與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境下，無力提供相應援助，降低了俄羅斯在獨協人民心目中大國地位和領導威信。因此，多數獨協國家獨立初期，國家領導人幾乎皆把與歐盟和美國之關係視為外交重點 (Лузянин,

2007: 190)，欲藉此爭取歐美經援，轉化為國內經濟轉型發展之有利資源，故經濟利益考量是各國對外政策的主軸與目標。而俄羅斯對原蘇聯加盟國掌控能力之勢微，使此地區出現政經權力真空，提供歐美介入拉攏與爭取原屬於俄羅斯勢力範圍之絕佳時機。美國更是積極地欲趁俄羅斯實力衰落之際，謀取當地政、經戰略地位，特別是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 與中亞地區。所以，積極地透過經貿合作和民主援助拉攏獨協國家，開始與這些國家全面接觸，發展關係與簽定一系列經貿、軍事合作協定。

首先，觀察「顏色革命」國家獨立後與歐美之外交互動。烏茲別克、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等國皆敞開大門，提供歐美軍事基地駐軍，以換取經濟收益。換言之，這些轉型經濟體在面對歐美新對外關係上，政府態度是基於經濟因素而開放的。然而，美國對中亞、外高加索國家的策略卻非僅著眼於當地能源資產之經濟層面，²² 也包括了改變當地政、經社會運作模式之企圖。因此，在投資介入中亞石油、天然氣資源開發的同時，對這些國家提供附加條件式經濟援助，要求其民主、開放和重視人權。如 1992 年美國通過「自由援助法案」 (Freedom Support Act of 1992) 和其他各種單項援助，先後撥款 90 多億美元幫助獨協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同樣地亦引用該法案對阿塞拜疆封鎖「納戈爾諾 - 卡拉巴赫」 (Nagorno-Karabakh, 簡稱納卡) 地區一事進行經貿制裁。然當美國發現這些國家領導人由於多源自舊蘇聯政權之官僚體系，不但貪腐又行政無效能，²³ 乃將對政府的援助多轉變為直接向各種非政府組織之「民主援助」。

22. 國際強權對此地區能源之明爭暗鬥當然不在話下，此類研究國內也相當多，如註六之前揭文等，故本文不再贅述。

23. 如美國花了 12 億美元在謝瓦爾德納茲政府，但卻未產生任何結果，捐款被官員污掉或流入私人的諮詢顧問公司。詳參：Wright (2004: 1)。

所謂民主援助，就是支持各國非政府組織建立各種文化機構，諸如報刊、電台及各類「公民社會中心」，使民主主義者和公眾可在這種公民社會中心聚會、接受培訓，甚至還可以觀看 CNN 等外國媒體節目，例如：在吉爾吉斯的中亞美利堅大學(America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公開宣稱，其使命之一就是推動建立公民社會，為留學生和非政府組織領導人去美國留學的交流計畫提供資金。據估計吉爾吉斯 2002 年得到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不低於 9200 萬美元的協助，這大約等於其國內生產毛額的 6% (Åslund, 2003: 85)，且其多年來接受國際金融組織貸款總額亦超過吉爾吉斯國內生產毛額的 10% (Åslund, 2003: 82)。在過去幾年內，美國在烏克蘭亦花費約 6500 萬美元。這些資金大部分用於資助當地非政府組織培養青年活動、支持獨立媒體、資助選舉監督組織和進行投票後的出口民調等 (Garton Ash and Snyder, 2005)。

美國除了官方條件式的經援外，非官方組織亦積極前進獨協這個新興市場。其中，索羅斯基金會 (Soros Foundation) 正是最大的資金提供者之一。從九〇年代初索羅斯基金會即開始在獨協各地設立分支機構。除了波羅的海三小國和白俄羅斯、土庫曼外，索羅斯基金會的相關機構已經遍布其他十個獨協國家。而在對顏色革命國家之資助方面，索羅斯基金會自 1996 年以來，向格魯吉亞提供了約 2 千萬美元資助。2004 年索羅斯基金會向烏克蘭提供的資金亦高達 540 多萬美元，向吉爾吉斯提供了 338 萬餘元(Независимая, 2005)。烏克蘭庫奇馬總統更是在索羅斯的支助下當選 1994 年總統 (Bruck, 1995: 68)。

除了美國外，歐盟與獨協之經濟互動關係亦是以經援方式為

主。著名的技術協助計畫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 for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TACIS) 從這些國家獨立初期即開始運作，主要目的在於改善當地基礎設施、公共企業重建、私有部門發展、制度及人力資源發展等 (European Commission, 1998)。如開放外資參與私有化投標的格魯吉亞，同時亦獲得技術協助計畫 (TACIS) 和世界銀行對其民營化企業重建的支持；在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案計畫將其電信、能源及航空公司採國際標進行民營化的吉爾吉斯，同時也獲得世界銀行協助重整其負債沉重的企業，故兩國的對外開放政策促使其私有化後的企業因外資與經援同時到位而加速現代化進程。總歸而言，西方與獨協之政經關係多著墨致力於以經援為條件，要求其改善人權、自由民主和經濟開放，因為國際貨幣基金會依據實證研究指出，在大多數轉型國家中，「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與「增加政治自由」間存在著相關性。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定期改選使人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0)。因此，在此論點下，西方以經濟援助作為操作工具和手段，其最終目的乃是在於促使該地區在政、經上落實西方認知下的民主、自由、開放。

然而，面對西方以經援作為經濟誘因之軟權力 (soft power) 外交攻勢，²⁴並非所有獨協國家皆欣然接受而樂於合作。其中，白俄羅斯對西方之民主輸出即相當反感。故即使 1997 年美國以「不尊重人權」為由，中斷對白俄羅斯之經濟援助。盧卡申科總統仍然無所畏懼地在 2004 年以公投方式為自己解除憲法中總統只能連任兩屆之限制。此舉又引發西方加緊對白俄羅斯進行政經施壓，攻擊其現行體制。但白俄羅斯當局仍未退縮，反而於 2006 年 3 月在明斯克機

24. 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逐漸趨於以軟權力作為外交主要操作工具。詳參：李明 (2006)。

場攔下九名準備以歐安組織觀察員身份前往白俄羅斯監督大選的格魯吉亞議員，並將其送回格魯吉亞。盧卡申科總統在公然與西方對峙之舉下，順利連任成功後，美國宣布對白俄羅斯實施政治經濟制裁，並停止高級官方往來。歐盟雖表示不會採取經濟制裁，但亦以限制簽證方式作為制裁（AllExperts, 2006）。然白俄羅斯完全無懼或屈服於西方對其實施經濟和政治孤立或制裁威脅，因為白俄羅斯並沒有資金儲存於美國或將受其控制的西方銀行，白俄羅斯與歐美經貿關係亦未深厚。加上白俄羅斯基本上只開放外資與當地的企業建立合資企業或以購買股份公司的國有股份、上市公司的股票等方式參與民營化，且依據白俄羅斯在 1997 年頒布的「黃金股票」（Golden share）法令，因允許政府在任何民營企業保有一定股權，以便在商業活動上擁有否決權，此種產權改革對外開放的情況使政府對企業經營權仍保有影響力。故多年來西方之經濟制裁恫赫對其根本無法構成威脅或牽絆。白俄羅斯對西方欲以民主理由干涉其內政的作法，當然可以採取相當強硬的姿態，斷然拒絕任何經濟誘因。

其次，觀察「顏色革命」國家對俄羅斯之外交態度。除了白俄羅斯外，多數獨協新興主權國家在獨立初期皆曾努力地欲擺脫與俄羅斯之傳統經濟聯繫和其影響，故對俄外交以採取保持距離為原則。烏克蘭獨立初期的「經濟自主」外交策略即是最明顯的例子（洪美蘭，2000：504-517）。1991 年獨協成立後，部分國家如格魯吉亞為了取得經濟決策自主權，宣布退出盧布區，部分國家則是基於情勢被迫退出盧布區。但由於獨協國家過去在蘇聯政經體制運作下，各國間經濟關係相當密切，特別是歷經史達林式的計畫經濟體制及力行專業分工生產體系後，彼此間生產消費關係屬於同一網絡，實難於短期間完全分離。獨協國家經濟轉型初期嚐試切斷與俄國經濟

臍帶，反而導致生產供需體系紊亂而陷入嚴重生產衰退。與俄國惡劣的政經關係使得各國經濟陷入困境。各國皆為脫離俄羅斯之過程付出慘痛代價，歷經一段為期不短的經濟嚴重衰退期（參閱表一）。²⁵ 雖然格魯吉亞、烏茲別克、烏克蘭、阿塞拜疆四國與摩爾多瓦成立了以這些國家國名首字合稱之所謂「古阿姆集團」（GUUAM）（Websites of the GUUAM Embassies in the USA, 2000），欲透過此區域性經濟聯盟發揮經濟整合效益，規避來自俄國經濟劇變衝擊（Salukvadze, 2000）。然而，俄羅斯卻將「古阿姆集團」，以及 2005 年 12 月烏克蘭、格魯吉亞、摩爾多瓦、波蘭、斯洛維尼亞、馬其頓、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於基輔所成立的「民主選舉合作組織」皆視為，不只是脫離俄羅斯之表現，更是接受歐美協助的反俄組織（Лузянин, 2007: 191-192），使雙邊關係相形緊張，降低雙方經濟往來互動的積極性，亦無益於獨協國家的經濟發展。

俄羅斯與獨協國家之經濟聯繫，除上述生產消費關係外，對俄債務關係亦持續增長。首先，多數獨協國家於 1991-93 年期間累積至中央銀行相對帳目的政府間貿易協定債務款項轉換成政府對於俄羅斯的債務（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2002: 11）。其次，中亞國家獨立後，除哈薩克外，其他國家外債金額都累積到了其國內生產總額的三分之二，他們對於必需品的債務達到出口額的四分之一（Åslund, 2003: 81）。國家貧困狀態使得俄羅斯國家工業因而能繼續出口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力低落的無人需求貨品至中亞。而為俄國商品尋找市場亦是自普利馬科夫（Yevgeniy M. Primakov）擔任俄羅斯外長以來的主要對外政策之一，俄國也確實

25. 雖然恢復過去蘇聯時期各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被認為相當重要，但獨協國家間的經濟整合卻存在著許多障礙與問題。詳參：И. А. Намазбаева（1999: 155-161）。

達成此外交目的。對俄羅斯而言，這其實是在盧布通行地區從其他國家得來的龐大補助金，並且強迫中亞國家接受這些貨品而成為其國家債務。

儘管獨立多年，至今獨協各國經濟運作仍很難降低與俄羅斯之經濟聯繫，特別是在能源產業方面，而這一方面亦是過去蘇聯經濟體系運作之貽害，因為運輸管線的關係使得各國須相互協調，但另一方面仍應歸究於俄羅斯積極投資。俄國自從普欽(Vladimir Putin)上台後，主動改變對獨協國家之態度，除了既有的商品貿易往來外，俄羅斯利用其熟悉這些新興國家經濟社會和地緣經濟(Geoeconomics)之優勢，積極地擴展投資關係。如在阿塞拜疆，雖然西方財團和能源公司因該國曾採取親西方路線之開放政策而捷足先登，但在俄國積極改善其與阿塞拜疆關係後，俄羅斯在該地區的利益，包括參與開採油氣；分享能源輸出利得和裡海水域資源等皆重新獲得保障，且其地緣投資優勢讓西方倍感競爭壓力。即使是獨立初期以拒絕加入獨協組織展現其欲脫離蘇聯體系的格魯吉亞，²⁶其大多數資產也都被俄羅斯在第三國註冊之企業或其子公司所收購，使俄羅斯可經由不夠透明的私有化過程在格魯吉亞從事其軟權力外交策略(Papava, 2006: 664-665)。

除了許多俄國私有化後的公司投資格魯吉亞外，亦有俄羅斯國有企業參與，而這亦受到格魯吉亞當時執政者之歡迎，如 2005 年初俄羅斯國有的「對外貿易銀行」(Vneshtorgbank)收購了格魯吉亞第三大銀行 - 格魯吉亞聯合銀行(United Georgian Bank)具控股地位的優先股(Papava, 2006: 665)。由於在地理上，格魯吉亞乃是俄

26. 格魯吉亞於 1991 年 12 月獨協組織成立時，並未立刻參與，而在調整對俄外交政策後，於 1993 年加入獨協，然玫瑰革命後又於 2006 年 2 月退出。

羅斯前進廣大土耳其市場和創造其與亞美尼亞經濟整合的障礙，故格魯吉亞特殊的地緣經濟，使其面臨歷史性抉擇：要繼續朝歐洲前進或退回到俄羅斯的範圍內（Papava, 2006: 664-666），此決定對俄羅斯而言具重大意義。

不僅格魯吉亞，「顏色革命」國家皆因先天不足，如當地特殊的地緣政、經環境問題或本身為內陸國家，難以引起外資興趣；加以經改落後、政經不穩等後天失調因素，尤其是貧困與貪瀆、不穩定的行政部門抑制了這些國家在吸引外資方面之成效。然當歐美投資者對此市場尚抱持觀望態度或只著眼於能源資源時，來自俄羅斯的諸多公司卻利用其熟悉該地區市場之優勢積極前進，不但已經控制烏克蘭的鋁業與煉油部門，他們的勢力在食品加工、冶金與機器部門、銀行與交通運輸業也漸漸增加（Ögütçü and Kinach, 2002: 31）。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經濟整合程度，更是不在話下。兩國聯盟之國家憲法草案於 2005 年都已經出爐，雙方並論及預期於 2008 年完成貨幣統一。

簡言之，俄羅斯可說是已經成功地利用其大型的企業與銀行扮演推動經貿外交的角色，維護其在獨協地區之地緣經濟利益，扭轉了獨立初期其在此地區處於劣勢之不利地位。而獨協國家在轉型初期採取對俄疏離之對外政策，歷經經濟衰退教訓後，皆已調整對俄外交政策，以務實態度重新看待與接納來自俄方的投資，建立以經貿關係為主之外交關係。

（二）開放政策效應

從上述可見，除了白俄羅斯採取保守因應的對外政經策略外，「顏色革命」國家在獨立初期皆把握西方欲入主獨協地區之機會，

對歐美國家採取開放政策，積極利用自身特殊的政經地緣角色，展開新外交關係，以爭取歐美所提供之相關資源。其對外政策明顯西傾，而輕忽甚至弱化與重要鄰邦 - 俄羅斯之互動，對俄採取疏離外交政策，欲藉此脫離莫斯科的傳統掌控。在政府此種外交決策與開放政策實施過程中，烏茲別克、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等國確實成功地將歐美駐軍轉換為另類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如吉爾吉斯從美國駐軍軍隊地方性開支中獲取之經濟收入就高達約其國內生產毛額的3% (Åslund, 2003: 85-86)。對吉爾吉斯這類貧窮國家而言，西方軍隊所帶來的收益對其經濟發展影響是相當顯著。然而，這些駐軍收益雖對財政有所貢獻，但卻僅是單次性的收益而非投資，故只能發揮短期經濟效益。

相較於白俄羅斯採取漸進轉型以及與俄羅斯經濟整合為主的對外經濟發展策略，在俄羅斯提供能源、原料與市場保障下，得以發揮白俄羅斯加工業優勢，轉型衰退因而能較快止跌回升 (參閱表一)。換言之，白俄羅斯政府善用「經濟整合」與「幼稚產業保護論」，即選擇在與俄羅斯形成經濟整合體之內，採取開放政策，但對經濟整合體外採取保護主義，避免西方企業的強勢競爭，影響本國幼稚產業的發展。此種對外經濟發展策略使其國家產業因此得以發展，裨益於實質性的經濟產值，帶來長期性的經濟效益。其次，阿塞拜疆亦成功地應用開放外交政策和其個體經濟資源優勢，吸引來自各國投資，且政府積極整合十幾國國家、二十四家國內外廠商，以聯合開採計畫引進至少 536 億美元之龐大外資和技術設備 (Der Leeuw, 2000: 149)，解決國內投資不足之困境，此舉對經濟成長之貢獻是有目共睹，近年來成長率高達兩位數字 (參閱表一)。但更重要的是其擅於將經濟資源優勢轉化為「能源外交」工具，對那些

想藉由投資獲利卻又想干預該國內政的國家給予相對較少的股權，以股權比例分配方式降低投資國以經濟干預該國內政之風險（Ebel and Menoned, 2000: 55-77）。此種結合開放政策與能源外交之作為，不但廣納外資又能掌握住資源主控權，未被外資所壟斷或買斷獨佔，對其國家經濟發展而言，無庸置疑地將同時獲取短期和長期政、經效益。但股權比例分配表現在私有化方面，即大多將所有權轉讓給舊有的企業內部人員，外部股東所佔比例較少，此種產權結構將降低外資參與的意願，有礙民營化企業現代化之虞。

儘管「顏色革命」國家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獲得長、短期不同經濟效益，然而同時亦帶來許多負面效應。首先，在採取開放外交政策，接受歐美國家經援方面，由於西方強調公共投資對這些非常貧困國家之經濟發展相當重要，故其經援方式主要透過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積極投入於建立該地區之基礎設施為主軸。不過，吉爾吉斯前總統阿卡耶夫之經濟顧問 Anders Åslund 卻在其文章中指出，許多觀察家已經證實這些公共投資是國家菁英們主要貪瀆收入之來源，且公共投資對於經濟成長少有幫助，因為直接預算支持只會造成過度公共成本與粗劣的公共品質，並提供當地官員養成貪腐惡習之機會，但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的代表仍鼓吹增加公共投資（Åslund, 2003: 82-83）。也就是說，西方經援方式卻助長了這些國家的貪腐亂象，部分經援資金被轉化為官僚利益團體之資助，壯大其勢力，對內鬥紛爭頻傳的現況而言，反而更將不利於這些國家後續的改革與穩定化之發展。

其次，對外開放政策實施後，國家發展方向出現更多元化的選擇。西方經援利誘和民主輸出，以及當地國家與俄羅斯密不可分的經濟關係，促使人民對國家發展方向有著不同意見，出現社會分歧。

歐美與俄羅斯彼此在該地區白熱化之競逐將提高國際因素影響當地發展之可能性，因為內部歧見易因此而被渲染擴大惡化，產生社會歧異動盪的負面效應。換言之，外力是助長內部社會分化對立之幫凶，如在此波顏色革命中，烏克蘭東、西地區兩大陣營對國家對外經濟發展方向與合作夥伴之看法分歧，在外力介入後擴大為國際關注之橘色革命（Hung, 2005: A.11）。此外，吉爾吉斯南北方由於人文歷史、地理經濟、自然條件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之明顯差別，在此次顏色革命中亦導致較俄羅斯化且工業發達的北方與深受伊斯蘭文化影響之南方傳統農耕區間，因經年累月的文化差異而不可避免的染上政治色彩（Interview with Roza Otunbayeva, 2005: 483）。兩國皆因內部既存之歧異，加上外部力量介入後，使得顏色革命發展為清晰對立的兩大勢力。

反之，阿塞拜疆、烏茲別克和白俄羅斯則因內部並無明顯的分裂現象，所以其顏色革命態勢並未擴大惡化，雖然外部勢力仍基於欲影響和獲取這些國家特殊的地緣政、經優勢而積極介入，甚至西方國家多以附加條件式的經援或透過民主運作方式作為其與獨協國家外交運作的工具，但並未積極拓展與強化雙邊經貿投資關係，此種重政治而輕經濟之外交態度反而讓部分國家和人民反感，因為其有干預他國內政之嫌。故西方國家此種「民主輸出」策略資助，雖從彼等「轉型」實施過程或明援暗助其「政經轉型」，但其結果是並未能順利在阿塞拜疆、烏茲別克和白俄羅斯等國產生「革命」的「骨牌效應」。所以，從這些新地緣政、經國家在面對及與強權互動的對外關係中發現，若本身國內既存著對國家經濟發展方向有歧異之社會矛盾時，易於給外力切入的機會，並可能在外力的推波助瀾下使社會意見分歧之現象顯著化與擴張化，此將可能造成社會轉

型成本增加，但也可能促使社會正視彼此歧見而加速轉型，故國際外力因素對這些國家後續改革發展而言，將可能產生有利或不利之非確定性影響。

最後，「顏色革命」國家與歐美新外交關係尚未能明顯獲得投資受益之際，俄羅斯積極善用過去經濟關係利基，拉攏及重建與獨協國家間之經濟關係，促使「顏色革命」國家逐漸修正獨立初期對外政策之開放方向，轉趨為多元開放發展路線，歡迎來自俄方投資，如阿卡耶夫在 2001 年普欽率團訪問阿塞拜疆，開啟改善兩國關係契機後，即公開表示歡迎俄國石油公司參與開發亞國能源（RFE/RL Newline, 2002）。然而，獨協國家在對俄羅斯經濟開放政策下，重建雙邊經貿關係及接受俄國投資方面亦皆引發一些負面效應。首先，在獨協國家尚無能力直接清償對俄債務之情況下，雙方協議以債務抵押交換（debt-equity swap）來解決，例如：藉此俄羅斯私人公司可以從塔吉克與吉爾吉斯公司獲得股權作為這些國家對俄官方債務的抵押補償。但這將使俄國對此地區經濟有更深的控制權與主導權，這些國家的經濟亦將提高對俄依賴之風險，故債務抵押交換被視為是雙邊債務清償之次優選擇，而非最佳解決途徑。

一如俄國聯合能源系統主席丘拜斯（Anatoliy Chubais）指出：俄羅斯今日對獨協國家的政策是自由帝國概念之更新版（Chubais, 2003）。所謂自由帝國概念是指其發展非透過高壓統治或前蘇聯的軍事佔領，而是透過對其領域內資產的獲得與發展。近年來俄國與部分獨協國家對外經濟關係爭議即是俄羅斯對獨協地區實施自由帝國概念之最佳事證。譬如：俄國在烏克蘭橘色革命後，調升對烏克蘭之天然氣價格，一方面欲運用能源供應策略喚醒烏克蘭瞭解俄國對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亦是基於國際能源價格持續攀

升之經濟因素。雙方針對天然氣價漲價爭議至今尚紛擾不斷。2006年1月在俄羅斯境內靠格魯吉亞 - 俄羅斯邊界輸往格魯吉亞的瓦斯管線破裂時，俄羅斯亦顯現出要在經濟戰爭中動搖格魯吉亞經濟的意圖 (Papava, 2006: 657-666)。當年年底俄羅斯更進一步以切斷白俄羅斯和格魯吉亞天然氣供應威脅，要求其同意在2007年支付更高的天然氣價格 (Buckley and Ostrovsky, 2006)。也就是說，國際能源價格飆漲之經濟誘因，促使俄國傳統的兄弟友邦 - 白俄羅斯仍無法倖免於被提高天然氣價格之命運。白俄羅斯與俄國的石油與天然氣爭議凸顯出，在全球化競爭和自由開放經濟運作下，各國經濟實質利益是相當現實重要的，經濟現實利益之挑戰將勝過於任何政治、外交承諾。因此，雖然大多數國家都歡迎外國直接投資，但對於這些深具地緣政、經意義的國家來說，提防那些顯明要誘使鄰近國家進入其自由帝國的非友善性國家投資是十分重要的 (Papava, 2006: 665-666)。這包括來自於東方俄羅斯和西方歐美勢力皆相同。

此外，由於獨協國家與俄羅斯在現今國際經濟架構中的比較優勢皆相當類似，主要以能源、原物料、天然資源和初級製品出口為大宗。在全球化背景下，獨協國家包括俄羅斯在內，彼此間形成競爭態勢。依據過去情況分析，除了亞美尼亞外，多數獨協國家的幣值相對於美元急速貶值，形成國家外債率急速惡化；且通常盧布貶值幅度更劇烈，而造成其他獨協國家在國際市場上之出口競爭力無法與俄國相抗衡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2002: 11)。譬如：受俄羅斯1998年8月金融危機影響，格魯吉亞貨幣也快速貶值。政府失去對格魯吉亞 - 俄羅斯邊界上南奧塞第亞 (South Ossetian) 與阿布哈茲 (Abkhazian) 之控制，許多廉價俄羅斯貨物走私進來。而在格魯吉亞的俄羅斯陸軍基地亦成為貶值盧布湧入格

魯吉亞市場的媒介 (Papava, 2006: 659)。換言之，俄國貨幣貶值進而前進其他國際市場之擴張行為，顯然已經壓縮到其他獨協國家在國際市場上之經濟空間。故包括「顏色革命」國家在內的獨協國家，其與俄羅斯無論在獨協內部自由貿易問題或對外國際貿易上皆有必要與俄國進行協商溝通，才能確保其經濟利益，雙方亦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良性競爭，互謀其利。因此，無論從俄國與獨協國家彼此間的外交關係，或雙方在國際市場上之經濟互動關係而言，俄國皆已經逐漸恢復對原蘇聯時期傳統友邦之經濟影響力。

總之，經由上述分析此波顏色革命國家對外政策及其操作實證後發現，由於「顏色革命」國家位居於歐美與俄國兩大政經體系間，此地緣政、經區位使其國家經濟發展策略擁有了既是優勢又是挑戰之特殊元素。其優勢在於，這些國家可利用其特殊地緣政經地位採行開放政策而左右逢源，靈活地游走於兩者間，為自身謀取經濟發展資源，例如：阿塞拜疆因勢利導地善用來自西方和俄國之投資，為其能源建立多元輸出管線，不但可分散出口風險並能獲取開闢外銷市場之效益。²⁷ 不過，實質上這些國家仍需面臨著相當高的風險與挑戰，其中最大的缺點即是將遭受來自雙邊之政經施壓，要求其符合強權所需之利益條件，成為經濟社會不穩定之隱憂，如烏克蘭和吉爾吉斯之顏色革命正是明顯的例證。而號稱與俄羅斯唇齒相依關係之白俄羅斯，同樣地也在俄國基於自身經濟利得考量下，對其

27. 蘇聯時期裡海石油唯一輸出方式為：從阿塞拜疆之巴庫經俄羅斯聯邦所屬之車臣共和國至黑海港口新俄城(Novorossiyk)，但現今可由巴庫經格魯吉亞之黑海港口蘇普薩(Supsa)或西方所計劃經土耳其之地中海港口澤依罕(Ceyhan)。但後者之出口將因成本高而使其能源失去國際競爭力。詳參：蘇武(2000：95-97)。

施予能源漲價的無情對待。²⁸

簡言之，部分獨協國家之對外開放政策，成功地利用其地緣優勢成為俄國與西方競相爭取的對象，進而從西方獲得經援及與歐美建立起微弱的經濟關係，亦促使俄方積極投資，如預期地達成原先規劃之政策目標 - 藉由外部經濟裨益其經濟轉型發展，雖然實質上而言，正面經濟效益其實相當有限，且從上述分析可知，對外開放政策亦使得部份轉型經濟社會之改革愈趨複雜化，帶來許多負面衝擊，甚至產生顏色革命，增加經濟社會之轉型成本。故總體而言，夾處於強權環伺下的小國，除了善用其特殊地緣優勢與採取務實政經對外政策外，實應當小心應對外力在國內之影響效應，並避免與單邊強權形成依賴關係。此外，阿塞拜疆和俄羅斯善於應用自身的經濟資源優勢轉化為外交工具，以務實而主動之對外政策為國家爭取國際政經資源與地位。尤其是俄羅斯，掌握獨協國家與其難於切割密不可分的經濟關係優勢，善用能源外交時機，加上有計畫地用心經營投資，藉由投資深入掌控獨協地區重要的經濟命脈，展現軟權力，最終使獨協國家又回歸俄方政經網絡中。成功完美的政經操作模式相當值得參考學習。

四、結 論

表面上獨協國家已經從共產極權社會轉型為自由民主國家，實施憲法政體、多黨選舉、私有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等。然而，在轉

28. 一如其他獨協國家，俄國目前對外政策也是以經濟目的之「國家利益」為外交政策最高原則。就維護和爭取國家利益之角度而言，普欽可說是此原則之最佳實踐者，其透過現實外交作為為俄國謀取經濟效益，在當今國際檯面上之政治領導人中，可說是箇中喬楚。與白俄能源價格爭議事件正是印證俄國現行經濟利益先於政治外交結盟之現實外交的最佳例證。

型多年，經濟復甦成長之際卻接連發生街頭運動革命，顯示轉型後的政、經社會並未符合人民期望。故本文選擇後共轉型國家最重要之轉型政策 - 對內之私有化政策和對外之開放政策，從這兩項變數著手，深入分析其轉型政策效應，藉此探討顏色革命和瞭解政府政策之重要性。

首先，在私有化政策方面，原政策目標乃在於透過產權移轉至私人所有來建立市場競爭機制，以茲提升經濟效率和成長。但由於蘇聯時期官僚階層和保守勢力之貽害，使得私有化政策執行過程弊端叢生，違反了透明化、公平化和企業自主化原則。準財政活動普遍存在和官商利用私有化政策壟斷社會資產的結果是，經濟資源浪費壓抑了經濟發展；一般人民之經濟機會被剝奪，內部產生社會不均惡化現象；競租行為、貪腐文化盛行；經濟社會問題積重難返。私有化政策之落實，實質上只達成「私有」、「私營」表象，卻遠離轉型理論所建議之政策目標。因此，私有化的負面效應引發民眾以群眾運動方式表達其對「政府失靈」之不滿，訴求政府再次革新，並逐漸形成一股新浪潮，發展為該地區特有的顏色革命，徒增當地轉型成本。而此次顏色革命雖然一方面顯示，民主種子已經成功地在這些國家領土中發芽茁壯，因為人民已經懂得運用人民力量來打擊施政效能低落和國家索賄之失靈政府，具備初步的民主意識，此將有利於未來之民主發展。故若革命後政府仍未能正視內部經濟轉型落後、人民生活貧困、兩極化不均社會、貪污腐敗等顏色革命發生的根本問題，對症下藥進行改革，一味地將政權視為權益再分配之利器，則政權不穩定與更迭將是無可避免。然另一方面，此次激化的顏色革命也凸顯出這些國家內部已經產生一股反政府勢力，社會和諧已遭破壞，相互鬥爭，例如：烏克蘭和吉爾吉斯人民對國家

發展方向，至今仍歧異，分裂為兩派，對其未來之穩定發展而言，此種對立態勢明顯的政、經社會狀況並非佳音，經濟社會勢必須付出較多的磨合成本。

其次，由於這些新興主權國家擁有特殊的地緣政、經區位，其對外政策常面臨在俄羅斯與歐美國家間抉擇搖擺之難題。在轉型初期，「顏色革命」國家中，除了白俄羅斯外，多基於經濟因素採取對歐美開放而遠離俄羅斯之外交政策，雖然成功地獲得經援和部分經濟效益，但歐美附帶民主輸出之經援方式，一方面使其社會意見與想法趨於更加多元化，對國家發展有所助益。但另一方面意見紛歧則可能提高社會分化對立之機率，特別是內部經濟轉型發展和地區族群文化生活已經存在著差異的國家，在政治危機導火線引發後，讓外部勢力有介入與推波助瀾之機會，促使社會意見分歧現象顯著化，此將可能造成社會轉型成本增加，為改革增添曲折，但亦可能促使社會正視彼此歧見而加速轉型發展。

儘管多數「顏色革命」國家在對歐美干預內政反感且未獲積極投資下，逐漸調整其外交政策，重新接納俄國投資。加以，俄羅斯善用過去與獨協國家經濟關係利基，積極投資。結果獨協國家對俄經濟依賴再度恢復，俄國逐漸重拾掌控該地區重要經濟資源。因此，對外開放政策之最終效應是，顏色革命國家可利用其特殊的地緣位置獲得來自歐美和俄羅斯兩強之經濟發展資源，但東西方霸權也都因此而提升其各自在該地區之影響力，此後顏色革命國家政、經社會發展將難以擺脫兩強權在此地區競逐這項外部干擾因素之影響。

最後，從分析此波顏色革命國家之轉型政策效應後證實：由於轉型經濟體處於制度重建之過渡時期，政、經社會制度皆尚未臻至完備，許多體制端賴政府規劃改善，因而具「暴力比較優勢」的政

府決策、政策執行與政府效能對改革發展深具影響力，將決定轉型進程順利推展或因政府失靈而徒增社會轉型成本。故其他轉型社會的政府應當以獨協國家的「顏色革命」個案實證經驗為戒：在對內政策方面，留心為人民經濟生活服務，提供公平之經濟參與機會和經濟社會質量均衡發展的條件；對外政策方面，除了注意避免陷入於依賴經濟強權而受其牽制影響外，亦需體認與認清經濟現實層面問題。而後者從俄羅斯和阿塞拜疆之外交策略運作上可獲得啟發：厚植經濟實力並轉化自身的經濟優勢為對外經濟關係之軟權力策略操作。故顏色革命亦證實，俄國深入當地投資之經濟軟權力外交比西方國家以附加條件式經援或透過民主運作方式為工具，更能發揮影響力，其乃是一條有效的外交途徑。

總之，一如俄羅斯總統普欽對格魯吉亞顏色革命不諱言地評論：格魯吉亞多年來在內政、外交和經濟政策方面犯了一系列錯誤，政權更迭是必然結果。即這些轉型國家政府以私有化政策和開放政策投入（input）轉型社會，原預期產出（output）是經濟成長、人民生活改善，但卻出現私有化貪腐、貧富不均、國際強權干預等，這些負面效果最後綜合發酵為顏色革命。比較顏色革命成功與否的兩類國家 - 顏色革命成功的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以及革命未順利的白俄羅斯、阿塞拜疆與烏茲別克，其經濟轉型政策效應情況與其革命結果，亦證明了轉型政策的負面經濟社會效應程度與顏色革命成功與否有關聯性。此皆顯示顏色革命實質上是這些轉型經濟體人民對具「暴力比較優勢」之國家政策的總體反饋效應，其凸顯出這些九零年代新興主權國家在邁向開放自由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各項經濟社會問題與矛盾衝突，這些問題亦將持續成為影響其國家發展之內部障礙與外部挑戰。

參考書目

- Åslund, Anders. 2003. "Sizing up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6, 2: 75-87.
- Намазбаева, И. А. (Namazbaeva I. A.). 1999.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Отв. Ред. М. Б. Кенжегузин. *Интеграц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155-161. Алматы: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МОиН РК.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2005. "Разве это дети? Нет, это не дет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in <http://www.ng.ru>. Latest update 8 Апреля 2005.
- Лузянин, С. Г. (Lyzyanin S. G.). 2007. *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России на "Большой Восток" (2004-2008 гг.)*. Moscow: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 Ögütcü, Mehmet and Jaroslav Kinach. 2002. "Ukraine: A Miracle in Waiting?" *Observer* 234: 29-32.
- Трубицин, Пер. А. (Trupishen Per. A.). 2006. *Це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взгляд*. Ташкент: Фонд им. Ф. Эберта. Abazov, Rafis. 1998.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Search for a Model of Development." *Central Asia in Transition* 61 in <http://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n/CentralAsia/rafis/rafis.html>. Latest update 13 October 2007.
- AllExperts. 2006. "Belaru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6." in

- http://en.allexperts.com/e/b/be/belarusian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06.htm. Latest update 1 April 2007.
- BBC News. 2006. "EU Bans Visas for Belarus Leaders." in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895264.stm>. Latest update 1 April 2007.
- Bruck, Connie. 1995. "The World According to Soros." *The New Yorker* 70, 46: 54-78.
- Buckley, Neil and Arkady Ostrovsky. 2006. "Russia Ready to Cut off Gas Supplies to Belarus, Georgia." in <http://www.ft.com/cms/s/0/bc3e259c-8b17-11db-8940-0000779e2340.html>. Latest update 13 October 2007.
- Chubais, Anatoliy. 2003. "Missia Rossii v XXI veke." (Russia's Miss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zavisimaya gazeta* in <http://www.ng.ru>. Latest update 23 October 2005.
- Der Leeuw, Charles Van. 2000. *Oil and Gas in the Caucasus and Caspian: A History*. England: Curzon PR.
- Ebel, Robert and Rajan Menoned. 2000. *Energy an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Lanham, MD: Ro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s.
-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08. "Economic Statistics and Forecasts, Selected Economic Indicators." in <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sei.xls>. Latest update 20 March 2008.
- European Commission. 1998. *Mid-term Evaluation of Tacis Programmes in Georgia-Final Report*. Brussels: Luxembourg.

- Eyal, Gi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2000.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 Verso.
- Fawkes, Helen. 2004. "A Nasty Business in Ukraine." in <http://news.bbc.co.uk/1/hi/business/3809057.stm>. Latest update 1 April 2007.
- Frydman, Roman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1.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Large-Scale Privatization: An Approach to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Vittorio Corbo et al. eds. *Reforming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Initial Results and Challenges*: 253-274.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Garton Ash, Timothy and Timothy Snyder. 2005. "The Orange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2, 7. in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ticle-preview?article_id=1795 7. Latest update 20 March 2008.
- Gerry, Christopher J and Tomasz Mickiewicz. 2006. "Inequality, Fiscal Capacity and Political Regime Lessons from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831. Michigan: 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 Havrylyshyn, Oleh and John Odling-Smee. 2000.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lled Reform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37, 3: 7-10.
- Hung, Mei-lan. 2005. "The EU-Russia Rivalry and Internal Rifts Underpin Ukraine's Elections Controversy." *Taiwan News* 24 January 2005: A 11.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0. "Transition Economics: An

- IMF Perspective 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ib/2000/110300.htm>. Latest update
13 November 2006.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IMF.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n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7/01/data/index.aspx>.
Latest update 20 March 2008.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2002. *Poverty
Reduction, Growth and Debt Sustainability in Low-Income CIS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 Interview with Roza Otunbayeva. 2005. “Kyrgyzstan’s Tulip Revolution.”
Demokratizatsiya 13, 4 (Fall): 483-489.
- McFaul, Michael. 2005. “Transition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3: 5-19.
- North, Douglass Cecil. 199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ecil.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Osipian, Ararat L. and Alexander L. Osipian. 2006. “Why Donbass
Votes for Yanukovych: Confronting the Ukrainian Orange
Revolution.” *Demokratizatsiya* 14, 4: 495-517.
- Papava, Vladimer.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orgia’s Rose

- Revolution.” *Orbis*50, 4: 657-667.
- RFE/RL Newline. 2002. “AZERBAIJAN, RUSSIA SIGN AGREEMENT ON CASPIAN DELIMITATION...” *Trans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6, 180 in
<http://archive.rferl.org/newline/2002/09/2-TCA/tca-240902.asp>.
Latest update 13 October 2007.
- Salukvadze, Khatuna. 2000. “Eurasian Corridor Pipelines: Undermining Transcaucasian Security?” in
<http://www.cacianalyst.org/?q=node/328>. Latest update 13 October 2007.
- Shushkevich, Stanislau. 2003. “Belarus: To Democracy Through Neo-Communism.” *Demokratizatsiya* 11, 1 (Winter): 55-63.
- Slaughter, Richard A. 2002. “Poor Kyrgyzstan.” *National Interest*68: 55-65.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7. “TI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in
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
Latest update 13 October 2007.
- The Government of the Kyrgyz Republic. 1992. “Legislation.” in
http://www.gov.kg/index.php?name=EZCMS&menu=35&page_id=85. Latest update 20 September 2008.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in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06/>.
Latest update 22 April 2007.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2006. “UNECE Statistical Database.” in

<http://w3.unece.org/pxweb/Dialog/Default.asp>. Latest update 20 September 2006.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6.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 2.0a June 2005 in <http://www.wider.unu.edu/wiid/wiid.htm>. Latest update 20 September 2006.

Websites of the GUUAM Embassies in the USA. 2000. "The GUUAM Group: History and Principles." in <http://www.guam.org>. Latest update 1 April 2007.

Wright, John. 2004. "Will Georgia's Economy Really Develop?" in <http://www.isn.ethz.ch/news/sw/details.cfm?ID=9121>. Latest update 1 April 2008.

吳玉山。2007。〈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台灣民主季刊》4, 2: 67-112。

吳玉山。1996。《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

李明。2006。〈十七大前後推動中共東北亞政策的軟權力〉。《從十七大觀察中國發展研討會》。台北：政大國際事務學院。

李英明。2002。《社會衝突論》。台北：揚智。

姜新立。2004。《大轉變：後共產主義與後社會主義研究》。台北市：唐山。

洪美蘭。2000。〈後共產主義時代烏克蘭之經濟轉型〉。《美歐季刊》14, 4: 501-530。

洪美蘭。2002。《經濟激進轉型策略-中東歐之經驗與啟示》。台北：翰蘆出版社。

- 郭武平。2007。《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政經發展之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台北：國家科學委員會。
- 趙乃斌、姜士林主編。1995。《東歐中亞國家私有化問題》。北京：
當代世界出版社。
- 趙常慶主編。2004。《十年巨變 - 中亞和外高加索卷》。北京：東
方出版社。
-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1998。〈東歐及中亞 26 國 - 白俄羅斯 - 民營化
與重建〉。 <http://www.tro-taiwan.roc.org.uk/de/ecoun-f.htm>。
2006/4/22。
-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1998。〈東歐中亞 26 國 - 喬治亞 - 民營化與重建〉。
<http://www.tro-taiwan.roc.org.uk/de/ecoun-f.htm>。2006/4/22。
- 龍舒甲。2003。〈論裡海能源與外高加索地區安全之關係〉。《問
題與研究》42, 2 : 95-113。
- 蘇武。2000。〈透視俄美在外高加索地區能源與外交的角逐〉。《歷
史月刊》144 : 94-98。

A Study on the Color Revolution in the CIS from the Effects of Transition Policies

Hung, Mei-lan^{*}

The governments in the CIS have already handed state power back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returned economic rights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privatization policy. They also adopted an open door policy to incorporat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after many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the color revolutions happened in the CIS. This showed that the transition policies have not reached the achievement anticipated by the public.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color revolutions took place using the view of consequentialism; that is, the color revolution is viewed as the repercussion effects and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transition policies that were implemented. The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ituations and the effects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nsitional policy, the obstacles to local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delve into the mean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color revolution, and then by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continue to prove the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of

-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government polici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iolence.”

The foremost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get the lessons from their experiences to benefit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other societies, in turn, contributing to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is paper. Secondly, because our country's research on the transition or the CIS is more focused on political theory, diplomacy or security strategy, this paper will change the research to an economical focus by choosing two main policies of these transition countries as the parameters: the privatization policy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The approach of this paper will help reach deep analysis and widen the topics of the studies on CIS in our country, thus increas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article.

Key words: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policy effects, color revolution, privatization policy, government failure